

澳門婦女的教育狀況 *

Mariette Bolina **

1. 序言

澳門社會的迅速發展及有關現象的複雜性對任何一個研究本地區的人士都不會陌生。

在這短暫的後過渡期中，在這地區內共存著不同種族、文化及社會特點的人口。這些特徵隱沒在朦朧的需求及神祕的外貌裏。它們對觀察家來說是極富價值的，因而增強了上述的複雜性。客觀及整齊的資料並不多，因此，個人以及零碎的本地區生活片段資料比用有系統及經深入研究得來的資料還重要。

在這樣的環境下，可知道討論澳門婦女教育狀況是一個有趣卻又富挑戰性的工作，並需要很多爭論及耐心。

2. 專題調查

對這專題曾作過多方面的調查，結果都對研討會目的有用。因在應邀參加研討會之前並沒有一個對這題材的研究計劃，我們只得向民間及官方的統計資料求助。根據這些資料，我們在婦女教育狀況調查中所注重的焦點反映出同樣的情況。對於我們的專業興趣，其內容是根據收集得來的資料而分類。在這工作中，我們考慮的是在正規教育系統中婦女的成就。

* 於“Workshop on strengthening Information Base on Women for Integration in Macao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研討會上之發言稿譯文。研討會由RETIL主辦，於1993年10月7,8在澳門舉行。

** 日耳曼語言學學士，教育學碩士，澳門中學教師及澳門大學葡文學院助教。

我們嘗試避免從一個婦女受壓迫及剝削的婦權理論而從一個仍存在很多社會中的傳統性別不平等的角度來尋找：

- (1) 提供一個有關婦女在澳門經濟活動地位及影響和華人婦女教育狀況的概略。
- (2) 強調婦女在國家及地區重點活動及在教育方面的影響力日漸重要。

3. 澳門的婦女出頭了？

Moita Flores (1993) 從過去二十年的調查總結出女性在本地區活動中的影響力逐漸增加，婦女投入工作的數目差不多倍增了，由佔整體的百分之二十九點二升為百分之四十四。

我們同意這婦女運動的出現並強調在此出現了來自中國的婦女。在過去十年的調查顯示出在澳門共存著不同國家的婦女，其中包括了來自中國的婦女。雖然避免了減低現存移民中性別的不平衡，統計暨普查司在近十年所作推測的主要假設指出需保持婦女運動在本地區的優勢。

91年調查（統計暨普查司1993）顯示在1993年8月31日，百分之五十一點五的居民是女性，而其中超過15歲的佔百分之七十七點九。根據統計，在這些居民中來自中國的婦女所佔比例甚高。因此，在本澳出生的居民中有大部份是男性。

女性在本地區居民及其有關種族文化社區中佔多數的情況是因有大量勞動人口從中國、菲律賓、泰國及其他國家湧入所造成的。而這些人進入澳門的理由及目的尚未清楚。但一般來說，都是因社會經濟問題及在短、中期尋求更多機會及更好的生活。

91年調查的數字顯示這群對本地社會經濟生活有積極參予的力量來自中下階層。婦女在勞力工作中所佔位置仍是較少，並逐漸轉為集中在寫字樓，管理及接待公眾等工作。這約佔了該階層人數的百分之六十點一。出奇地在雜工及工業技工——機械技工及司機這兩個傳統上屬於男性的行業中，有婦女的“侵入”，約佔了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八點七及六十五點八。

這些調查並沒有提供14至49歲之間女性人口在職業及學歷上的關係。而學歷及性別關係則受其子女數目所限制。1990年職業問卷向我們提供了一些有關資料。就是可從職業與學歷、性別的關係尋求發現婦女是否因缺乏學歷而只能任職一些較低下的工作，或另有原因來解釋這些選擇。Moita Flores (1993) 在沒將女性人口分階層的情況下提出一個假設，那就是澳門的婦女可擁有比其異性更高的學歷。雖然如此，她們參與社會工作的機會仍有限。

好像應要討論一下澳門婦女的出頭除了數量外，是否擁有相對的質量。若有，在甚麼程度，哪方面或在哪些團體可見。希望這研討會的結論能給這問題一些指引甚至提供答案。

4. 澳門女性與國內來女性移民的學識水平

根據教育暨青年司資料（1993年），澳門的正規教育有一個頗高的入學率，其中女性佔大部份。這非高等教育的對象是3至17歲的人士，其中包括預備班，小學及中學。綜合最近一次教育問卷調查（統計暨普查司1992年）的資料，可發現差不多所有5至14歲的兒童都能入學，在這年紀的兒童中只有約百分之零點三未能入學（男女相同）。在6至11歲的兒童中，則有百分之十的女童及百分之九的男童是失學的。在12至17歲的兒童中，女性入學率則較男性高。這可解釋為由於不適應學校制度，男童放棄學業的比率很高。另一方面，在成人教育的課程中，報名人數裏有百分之五十三點一為女性，而其中有百分之七十三完成了課程。

這些資料數據似乎與一個被默認的“真相”相吻合，就是在澳門基本上是不存在文盲的情況，但這些資料未能顯示成人，尤其是外來移民的文化程度。在澳門並無有關文盲的統計資料。成年人，特別是女性的文化程度及數學程度還是未知數。這些資料對本研討會的目的都很重要。因它們能改善那些輔助婦女溶入澳門發展的政策。因此，我們嘗試通過推論顯示在女性人口中，特別是中國女性，可能尚有文盲存在。在這裏，文盲只是指基本及功能上的讀、寫能力*。

根據1990年統計暨普查司的資料，在外來移民中女性屬學歷較低的一群。我們相信若詳細考慮中國近十年在教育方面的動盪，如對基礎教育，非正規教育及掃盲的改革，可得到有關大部份澳門婦女教育的寶貴資料。因此這方面溝通的範圍只能讓我們把問題帶到能在這討論的層次。

在十九世紀初，在中國強烈地感覺到需要推動婦女教育，明白到女性比男性低微，永不能接受與男性一樣的待遇及教育女性的目的是為著使她們完全服從而並非為精神上的培養的儒家思想。（引述“孔子”，第128頁，Bashford，1916）。

當權派開始把教育，特別是婦女教育，跟社會發展拉上關係。主要是透過西方的影響擴展及鞏固教會學校。這些學校的大門為女性而開並為解放婦女智慧作出貢獻。

在一九一四年，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稱：“我們必須研究怎樣發展女學生的智慧及能力。若非如此，中國要晉身文明社會是沒可能的”。（Cleverly 1991年第47頁）。

雖然中國政權在婦女教育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問題上不斷加強意識型態的改革，“在1924年，中、小官校中女性約佔總在學人數的百分之三點一四及六點三四，而在教會學校方面，則有百分之十七及三十”。（Cleverly，1991）。

五十年代，中國在農村進行了大規模的婦盲運動，其目標是令農民們能寫讀450個生字。而其計劃是通過政權提倡實行及發展土地分配的觀念，並增加農民對耕種技術的認識。（Ahmed 1991年）。

* 在本文發表後公佈的數據，反映15歲以上居民的入學率。然而，由於調查未有將男女性別分開，不能另作結論。說華人口中有4.9%不懂得閱讀及寫，13.9%小學以下程度。這似乎肯定了本文所指的存在文盲的情況。

全日及半日制小學遍佈全國並達到成效。雖然這些50年代的活動受到其後的文化大革命的衝擊，中國的文盲數字由1949年的百分之八十下降至1990年的百分之十二。（Ahmed 1991年）。

根據M. Ahmed（1991年）所指，在中國仍有一億八千萬15歲以上的人士是文盲。而其中三分二是女性。同時，根據中國第四次全國調查，他亦指出在統計中，女性未能入學的數字是很高的。近期資料顯示，在今天的中國成人文盲亦達百分之十五點九（南華早報1993年）。

5. 澳門的教育制度裏的女性

無論在東方或西方社會中，照顧孩童常被認為是女性的工作。這古老的假設長時間製造了“男主外女主內”的情況，而這思想現仍存在。（Kenway 1991年）。根據Kenway（1991年）所指，這兩種工作的配合是由社會對男女定義中雙方同意所持權利所造成的。

我們估計當女性開始出外工作，及如在澳門，主要在幼稚園及小學任教及就讀，這情況便能達到和諧。

跟隨著世界潮流，澳門亦擁有世界性漸進的民主教學及教育。在中國，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裏，女性的地位及重要性逐漸提高（Cleverly 1991年）。澳門的教育內容一向以來都取決於中國社會的文化及教育傳統。（Bolina，1993年及Bolina與羅1992年）。天主教會在這方面的影響亦很大。即如我們所見，教會學校在從前，即使到今天，在女性教育方面皆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力。

在本地區的私校中，半數以上屬於教會學校。其中女性教師佔了約百分之六十二（教育暨青年司，1993年）。

現時的統計數字（統計暨普查司及教育暨青年司1993年），告訴我們百分之六十八的教師是女性而女性在與男性共事時，仍能出任負責人及主管職位的。在本地區教育機構中百分之五十一的領導人職位是由女性擔任的。

因此，我們不能忽視在這表面上職業平等的情況中，女性教師大部份是負責兒童的教育，對青少年、青年及成人的教育則由男性負責。若我們留意資料，可發現在越高程度課程中，即中、大學課程，男女教師的比例存在著急劇的轉變。至於在中國出生的教師中，女性教師所佔比例較低，即只佔教師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七。

若我們分析有關教師學歷的資料，可看到女性教師擁有較適合出任幼稚園及小學教師的學歷。而到中、大學的程度的教師，則是男教師擁有較適合的學歷。這情況似乎符合了傳統社會的論說，女性教育兒童，男性教育年紀較大的學生。

6. 結論及建議

根據有關的數據，我們相信要承認：

- a) 在澳門女性中仍存在著文盲。這是要掃除的。
- b) 在任職教師中，婦女是社會重要的一群。因她們在學校中將知識、行為及在以後50年一國兩制的特殊統治下把人民的價值觀傳播開去。

澳門政府對這群專業人士一直不斷增加培訓及資助，好像與聖約瑟中學，澳門大學及廣州華南師範大學簽訂合作協議。我們相信，通過不同程度的教育來消除兩性之間的距離是重要的。這些行動應以學校本身推廣的性別及專業模式的意念作指標。基本上，它們是為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而吸引更多人加入這行列。因缺乏有關婦女教育水平的資料，加上普遍相信文盲並不存在，故此可理解為何沒有向這群人提供教育。

最近教育暨青年司根據法律來作出實施成人教育的計劃的研究。而在民間社會，即使大力為中國年青人的教育尋找答案，並沒有推動婦女的基本教育。一個到七十年代仍致力為婦女提供課程的協會向我們表示並不知道現時有任何同樣性質的工作在進行中。

澳門教育綱要法（澳門，1991年）的第一條第一點指出澳門居民“應有受教育之權利”。為此進行了保證維持有利整體人格發展，社會進步及民主社會的持久活動，而第十四條則著重於成人教育。除了掃除功能盲及文盲外，其目的還有推廣公民教育社會文化教育。

我們的意見是教育並不單圍繞著文化及數學的程度，甚至在功能方面，而一個國家的發展亦不限制於其經濟發展及國民物質豐富的情況。教育發展產生多方面複雜的問題。這都是政治及民間權力機構需處理的。在我們處身的動盪社會中，統一化，經濟的發展及不正常的消費加強了人性及思想價值觀的空隙。

平衡經濟發展及個人及社會發展的需要時常被當作倒退的行為。提高對個人需要及其在道德社會、認知、物質及肉體各方面選擇機會的觸覺是必須的。

婦女們應認識到還有需補救的地方。只有一個不分性別及有長遠計劃的教育才能做到。我們知道中國婦女都把幸福與安逸的家庭生活拉上關係。追求這種家庭生活是合法的。但需認清及警覺到在這安逸中存在著個人、文化及社會各方面的危機。我們堅持只有教育能達成目的。在這方面，婦女在短、中甚至長期都很有力量。一種清晰機構性而神祕的力量。這些力量在教育綱要法的大原則指引下，在教師的教學課程中被弄清楚及認知。而在澳門各學校任教的女性都得悉其漸增的力量並節儉地，耐性地及堅持地使用它們，尤以中國女性最能發揮這些優點。

參考文獻

Bashford, James, W. (1916年), 中國——個演譯, 紐約: Abingdon出版社。

Cleverly, John (1991年), 中國的教育(第二次版)雪尼; Allen & Unwin出版社。

教育暨青年司(1993年), 教育數據, 澳門。

統計暨普查司(1990年), 職業問卷, 澳門。

統計暨普查司(1993年)第十三次人口普查, 第三次房屋普查, 澳門。

統計暨普查司(1993年a)澳門人口及房屋的特點, 第十三次房屋普查, 澳門。

統計暨普查司(1993年a)1990至2025年居民人口的推測, 澳門, 二月。

澳門政府(1991年)第11/91/M號法律, 澳門政府公報第34號之副刊, 1991年8月29日。

Kenway, Jane (1991年), Dawkins, David (1991年)在階級、性別及私校教育的明顯消耗, 教育權力及政策, 倫敦, Falmer出版社。

Moita Flores, Francisco (1993年), 91年普查及澳門人社會——一些有關生活, 死亡及婦女的想法及假設。

有關澳門及珠江三角洲人口國際研討會的準備工作, 澳門, 十月。